

心海之波

老溪 著

中國建材工业出版社



心海之波

老溪著

中國建材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海之波/老溪著. —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7. 6

ISBN 978-7-5160-1884-2

I. ①心… II. ①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7217 号

心海之波

老溪 著

出版发行：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 号

邮 编：100044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2

字 数：201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39.80 元

本社网址：www.jccbs.com 微信公众号：zgjcgycbs

本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我社市场营销部负责调换。联系电话：(010)88386906

目 录

一 儿时琐忆

塔糖记忆	003
儿时听收音机	004
儿时偷瓜	006
小时侯,有人夸奖我	007
于大脚商店及其他	010

二 家庭生活

硬妻子与软丈夫	015
恋爱和结婚	016
我的婚礼	018
没有电视的日子	020
没钱的日子	021
年时美味——咸菜	023
我家来了俄罗斯小客人	024
跑了一只小乌龟	027
小乌龟要自由	029
对门	030
节约和浪费	032
病后小记	034
眼泪与胃病	036
我玩农场	037

一个梦	039
抢票	040
“年”与日子	042
临近退休	043

三 气候与人

正月雨	049
丰年好大雪	050
50年罕见大雪	052
蹒跚的早春	053
凉爽的夏季	055
高温小记	056
雾霾	057

四 凭栏浅思

积累	061
话里有话	063
评点女人	065
我的人生观	067
赢得一份踏实	069
举手之劳做好事	071
人生三味	073
为菜不平	074
事先与事后	075
感觉与记忆	077
随礼随想	078
我的元旦寄语	080
小感悟	081
拖鞋与鞋套	083

五 临窗近眺

关于猪肉涨价的思考	089
限塑,需要人人来做	091
休息的红绿灯	092
奥运心情	094
“网络美学”初探	097
警惕网络陷阱	100
参加了国际比赛	104
读明清中篇小说	105
观《动物世界》有感	107
“一次性”还要走多远	109
茶蛋热乎的	111
调侃广告	113
售货员的过度热情	115
耐人寻味——相声的魅力所在	116
是诗远离了我们,还是我们远离了诗?	118
为了 17 棵红树	121
他还是他	122
行路难	124
噪声	127

六 出去走走

出国	131
来到满洲里	144
北京印象	156
半岛之行	166

儿时琐忆

—

塔糖记忆

小时候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卫生条件更差，人们除了吃不饱，还要受着各种疾病的困扰。那时我们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不觉得挨饿，但疾病却是摆脱不了的。而最常犯的一种病就是肚子疼。虽然有病，人却抗造，很少因为头疼脑热去看医生的。当然我们根本就不把肚子疼之类的当作一回事。

肚子疼的时候，大人为我治疗的办法就是在热炕上趴一会。一说肚子疼，大人就说：“上炕上趴趴。”说也奇怪，在热炕上趴一会，疼痛还真能缓解。

为什么会肚子疼呢？大人们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肚子里有虫子。怎么治肚子里的虫子？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至于预防，大人的办法就是不让我们吃脏的东西。但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为那时人们并不在乎东西脏不脏，通常都是拿起来就吃。我们学的拍手歌也说：“你拍九，我拍九，饭前便后要洗手。”可是没有人能真正遵守这样的规矩。为什么在热炕上趴一会就能缓解？我们也不懂。对于肚子里有虫子，我们似乎也不害怕。只要肚子不疼，我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

刚上小学没有几天时间，老师就让我们做一件事：早晨起来大便后，用火柴盒装一点自己的粪便带到学校。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几乎每个同学都拿着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火柴盒。大家互相挤眉弄眼，装模作样地手掩口鼻，躲避臭味，好像很羞涩很文明的样子。其实一点点粪便，装在火柴盒里，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根本就闻不到气味了。我们把火柴盒都给了老师。我还记得，那天早晨老师的讲台上放了一堆火柴盒。

几天以后，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小包塔糖，也就几颗吧。塔糖的样子就像现在的冰激凌上面尖的那一部分，像个小宝塔。回家后，我就按照老师说的方法吃了。微微有点药味，而更多的是甜味，很好吃。

吃完塔糖的第二天早晨，我在粪坑边大便，便下了一大堆蛔虫。那蛔虫都是很细很长的，绞成团裹在粪便里，还蠕动着，样子很吓人。但我当时似乎并没感到害怕，倒觉得很有趣，既痛快又过瘾的那种感觉，身上也轻松了许多。这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的肚子就没疼过。后来也有肚子疼的时候，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蛔虫。

在我们小的时候，对有甜味的东西的向往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很想再吃塔糖，但是老师不发了。留在记忆里的，只有这一次吃塔糖的经历。现在想来，那塔糖应该就是一种杀蛔虫的药。国家关心儿童的健康，知道我们肚子里有虫子，就给我们这样的药吃，而且确实有效果。又因为是给孩子吃，就做成很可爱的形状。为了好吃，里面还加了很多糖。

要说国家对孩子的关心，我体验到的还有种牛痘。我记得是在学校里做的。医生让我们撸起衣服袖子，露出上臂。医生用一个很小的刀子蘸了一点药水，在我的胳膊外侧轻轻划了一下。我只是微微觉得有点疼，什么事都不耽误。后来在胳膊上划刀的地方就长出了一个枣核大小模样的疤痕。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种牛痘是怎么回事。这是一项预防天花的手段，发明者还得过诺贝尔奖。我们还见过一尊雕像的照片，照片上一位外国医生俯下身子为一个孩子种牛痘。现在的孩子不吃塔糖了，但牛痘还是种的。小时候，我确实见过许多脸上有麻子的大人。也许是因为年纪小，对长相不太在意，所以我感觉长麻子的人并不特别难看，而且别的方面都很正常。

如今人们的寿命延长了，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这除了和生活质量好了有关之外，我认为还跟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关。现在的小孩子要打多种疫苗，过去多发的病得到了控制。至于怪病增加，人们谈论健康的话题增加，有部分原因是人们格外重视生命。过去各种各样的怪病何尝少过呢？只是人们不太注意，条件又不允许，顾不上去管就是了。至于一些因为生活习惯、工作环境而增加的所谓“现代病”，则另当别论。

儿时听收音机

小时候，可以算作文化生活的，除了看电影、看“画本”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是听广播。关于电影，我曾专门写了一篇《儿时影事》，用以记述，这里想写一点关于听广播的往事。

小时候我住在一个小镇上，算是农村吧。我家的条件比周围的邻居稍好一点，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晚上写完作业，得到奶奶的同意，我可以打开收音机听听。这听收音机就是我唯一可以了解一点外面世界的渠道，也算得上是我小时候最能得到心灵洗礼的一项活动。当时我没有什么优越感，

但现在想来，和邻居小伙伴们相比，那真是一项偏得，一种福气。

我当时无法理解收音机的工作原理：这么一个小匣子，里面怎么会有人说话唱歌呢？而且话说得那样好听，即使是预报节目播送新闻，也是那样好听，尤其是女声。我常在心里想：说话这样好听的人，长得一定好看，她什么时候能出来让我看看呢？我甚至在收音机的前面后面转着看，希望能看到这个说话好听长得好看的人。在孩子的懵懂时期，这几乎成了我的痴恋。

我还跟着收音机学过几首歌。有一首歌的歌词我还能记得一段：

“有这么一个星期天儿，我家的门口一拐弯儿，来了一位老奶奶在路边儿。走一步，挪一点儿，走了半天也没多远儿，原来她是串亲戚呀，找不到家门在哪一块儿。”

这首歌唱的应该是当时农村的变化，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别的词了，只记得每唱这首歌时，我就不自觉地想：怎样才能帮助这位老奶奶找到她的亲戚家呢？还有一首歌是《求大同，存小异》，那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写的歌，我也听不懂。但结合一些传闻，一些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似乎有一种预感：要出什么乱子了。

我最喜欢听的，当然是小喇叭节目。一听到“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嗒滴嗒，嗒滴嗒，滴嗒”，我就心花怒放了。

小喇叭里的节目，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孙爷爷的故事。孙爷爷用缓缓的、温和的、浑厚的声音说道：“小朋友们，我给你们讲一个志愿军的故事好吗？”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听着孙爷爷的讲述，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美军基地，停着许多汽车，志愿军战士端着冲锋枪，在汽车中穿行，一会用汽车隐蔽身体，一会又向前迅速跑动；一会用冲锋枪扫射敌人，一会又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人群里。那场景在我的脑海里非常清晰，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就像看电影一样。

再就是，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工人纠察队”“造反派”“走资派”“传单”“大字报”这些词汇，很及时地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我在还不明白事的年纪，比邻居家的孩子多听到了许多不能明白的事。

我趴在收音机前，全神贯注地听歌、听新闻、听故事，尤其是听故事，每次我的心都会被紧紧抓住，脑海里就会出现故事的场景，生动、清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想象，也不知道这样能培养人的想象力。反正一听别人讲故事，我脑海里就会有形象，场景、人物、活动、过程都非常清晰。我曾看过一些故事书，比如《七侠五义》、《小五义》等，那故事的场景也会在我

脑海中出现，甚至人物长什么样，我都非常清楚。我把从书上看来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他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的。

所以每想起小时候听收音机时的感受，我就对如今日益发展的先进教学手段产生疑虑。现在提倡用形象化的手段演示各种教学内容，非常直观。懂是极容易懂了，但学生的想象力却退化了。如果让专家来说，退化的还不仅仅是想象力。

我怀念儿时听收音机的往事和感受，我觉得人类应该在自由王国里给自己留一点自由的空间。

儿时偷瓜

如今的西瓜、香瓜之类的，一上市的时候，动辄几元钱一斤。虽然我也吃得起，但我却并不怎么想吃。这就使我经常想起儿时吃的瓜。那时的瓜在最火爆的时候也就几分钱一斤，有时就干脆几角钱几元钱地“估堆”。不过虽然便宜，作为孩子的我却仍然买不起。要想吃瓜，只有动心眼。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当时的行政级别是公社，行业以农业为主，算是农村吧。公社下辖很多生产队，生产队又分大队和小队。开春的时候，每个生产队都要划出一块地，用来种香瓜、西瓜，一来可以给社员增加一点夏季水果，二来可以给队里增加一点收入，三来可以用来和别的行业、单位搞关系。

瓜地从秧苗发芽开始，就由专门的人昼夜守护，负责侍弄瓜苗，打尖打杈；等瓜坐了果，守护人就看瓜。那时好像没有人偷瓜。如果是走路的人经过瓜地，看瓜的人会请你吃瓜，并不收钱。在我的记忆里，只要你把瓜瓢瓜子甩进地边的桶里就行了，这是明年做种子用的。也是因为瓜多。莽莽一地的香瓜、西瓜，你能吃几个？如果你夸一句“瓜真甜”，那看瓜的人就会非常满足。不过因为瓜地一般都离镇子较远，我们似乎没有专门去寻找的心气，即使是在很馋很想吃瓜的时候，也鼓不起去寻找瓜地的勇气。

等瓜熟了，生产队会用马车拉着香瓜、西瓜到街上卖，这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动心了。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两三个小朋友一伙，在车上偷瓜——主要是偷西瓜。卖瓜的大车一到街上，周围就围满了

人。车上卖瓜、看瓜的人有好几个，忙活着给买瓜的人挑瓜、称瓜、收钱，也注意着有没有人偷瓜。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挤进去，拿一个瓜转身向外走，不称、不交钱，是逃不过看瓜人的眼睛的。我们的办法是：一个人挤进去，另外一个或两个人在外面等着。挤进去的人假装挑瓜，翻弄敲打一通，拿起一个瓜，递给后面的人，说：“你看看这个瓜怎么样？”然后回过头来继续翻弄敲打，好像并不走，还要挑瓜、买瓜的样子。等看准一个时机，没有人注意，他便悄悄地抽身出来。因为这时他手里没有瓜，所以看瓜的人并不管他。从瓜车上下来后，在外围接应的小伙伴早抱着瓜走远了。于是我们找到一个僻静处，把瓜砸开，尽情享用。其实我们并不会挑瓜，所以常常偷出半生不熟的瓜。但不管生熟，我们都要大吃一顿。

这样的事做了几次我也记不清了，反正一次也没有失败过。这是西瓜。至于香瓜，做起来比较难，所以吃得少。在我的记忆里，香瓜比西瓜好吃。但不管西瓜还是香瓜，都是很甜的，比现在的各种瓜强多了。

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都是错的，不应该的。那时我们也知道不对，但小时候因为嘴馋，没有办法。谁让大人们不给我们钱买瓜呢？

■■■ 小时候，有人夸奖我 ■■■

我从小就是个不受大人喜欢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又丑又傻吧，当然也就很少得到别人的夸奖了，所以偶尔有谁有意无意地夸奖我一句，就会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爷爷在车站上班，上班之余就到山上野外刨些地种，那时叫“小开荒”。在我的记忆中，我家这样的地有七八块，分散在远近不同的地方，小的只有十几平米，大的也就亩把。车站有头牛在我家里养着，有人上地时就赶着牛车去。我也经常跟着爷爷到野外，坐在牛车上，嘎悠嘎悠地走。在路上我是不累的，到了地里我也只是玩儿。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草甸子里刨地，那是新开一块地。爷爷歇着的时候，我就学着爷爷的样子刨了几镐头。那时我也就五六岁，刚刚能把镐头举起来。恰好有个认识我爷爷的人走了过来，说了句：“看你孙子还挺带架儿呢。”这大概是我听到的大人对我的第一次夸奖。

爷爷去世后，家里外面的活都是我和姐姐干的。那时我也就十岁刚出头，却承担了上山拣柴、到野外种地，还有拣煤核、扒树皮、挖野菜、打场推磨、锯木劈柴等一系列责任，真是不堪重负，常常累得头晕眼花、腿软手麻。看着还有那么多的活等着干，我心里真是犯愁。可是这也锻炼了我，使我的身体长得比较结实。有一次，邻居的一个奶奶到我家串门，和我奶奶唠嗑的时候说了一句：“你看平（我的小名），肩膀平，长大一定有力气。”这是我记得的大人对我的第二次夸奖。虽然我长大之后力气并不大，但我的肩膀比较平却是真的，尤其穿上西服后更明显。所以，我相信当时那位奶奶说的是真话。

爷爷去世后，我的脾气变得很怪，动不动就发火、顶撞人、摔东西，奶奶管不了我，就让父亲把我领走了。那时我刚上中学二年级。临走之前，我们到邻居家串门，说起了转学的事，父亲担心我到了另一个学校跟不上课。邻居家的聚成哥说了句：“没事，平到哪儿都能跟上。”我们平时都是小哥们，说笑打骂的时候都有，但从来不说我在学校的事。我自信在学校是个好学生，聚成哥能在家里承认我的学习，一定是知道我在学校的表现，所以我当时的感觉是骄傲了一下。

转到新的学校后，有一次我到邻居家串门。很多人坐满了炕沿，我坐在一端。在这样的场合，我一般是不说话的，只听别人说。坐在炕里的刘大娘（邻居家的女主人）突然说了一句：“平的眼眉挺好看。”我听出这是说我。回家后我照镜子，从侧面看，眼眉还真的挺顺眼。所以我知道，刘大娘当时说的也是真心话。

刚上高一的时候（那时是九年一贯制，高一应相当于现在的八年级），有一次我到邻居毛大爷家去玩。看到他家的书架上有套《三国演义》，建国初出版的，竖排版，繁体字，两卷本。我想借来看看。毛大爷的意思是我看不懂，不想借，但最后还是借给了我上册。回到家里，我急不可待地读起来，牢牢地被书里的故事吸引住了。那感觉就像蚊子见了血，真是如饥似渴。我是第一次看这么厚（尺寸厚、历史感厚重、文化底蕴深厚）的书，手不释卷，几天时间就看完了。我去还书，想再借下册。毛大爷接过书，似乎有些诧异，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快就看完吧。他问我一句：“黎庶是什么意思？”我一愣神，马上就说出来：“就是老百姓。”毛大爷立刻高兴地说：“哟，平的文化挺高啊。”旁边的毛大娘接了一句：“嗯，这个我赞成。”我心里是一阵轻松，仿佛通过了一场考试。毛大爷自然也就没有再犹豫，把下册借给了我。

小时候，我在家人、邻居、同伴面前受到的夸奖大概也就这几次。在学校里，得到同学夸奖和老师表扬的时候就比较多，在这里我也举几个例子。

我正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次修“轻轨路”的劳动，连续好几天。劳动休息时，我就给同学讲刚看的三国演义故事。当讲到关羽被曹操俘去，斩严良，朱文丑那段，曹操夸奖关羽，关羽表示谦虚时，我按照书上的原话说：“丞相过誉，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有若探囊取物。”旁边一位同学立刻用羡慕的口气说：“啧啧，看人家这记性。”我当时心里颇有些得意。《三国演义》中的许多章节我能大段地背出来——其实我只看了一遍。

一次数学课，数学老师拿着我的作业本说：“你们看看×××的作业，你们怎么就不能学学呢？”一次化学课上，老师说到“质量”这个词，问了一句：“质量是什么？”我猛然想起课外在《十万个为什么》里看到一次对质量的解释，就小声说：“就是重量。”化学老师说：“好了，我听到一位同学回答了。”我当时心里真是很舒坦。这位化学老师在批评学生学习不努力的时候，还说过：“你们同学里有可以当你们老师的。”我知道她说的就是我。虽然后来那些不学习的同学很多比我有出息，但我仍然感谢老师，自信当时我在老师眼里是最棒的。一次选举班级干部，没有合适的人选，有个同学提了我的名字，随后另一名同学就说了句：“×××学习天下第一！”于是老师就让我当了学习委员。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成为我后来在不如意时咀嚼自慰的甜果。

参加工作以后，因为我工作很努力，也有些成绩，在领导、同事、朋友的口头上经常听到夸奖，但我却不大当回事了。也许是夸奖多了，不再在意；也许是年纪大了，眼界不再那样浅；也许是别人的夸奖带了讨好、虚假的成分，视同玩笑。总之是不想说了。而且我写的题目是“小时候，有人夸奖我”，再说就跑题了。

从我小时候受到夸奖时的心情，想到现在提倡的对学生鼓励为主，我非常理解其中的意义。孩子听到别人，尤其是师长的一句表扬，哪怕只是一个肯定、一个同意，都会感到温暖，受到鼓舞。所以做教师的不应该吝惜对学生“说好话”。需要注意的是，夸奖孩子一定要有根据，让孩子接受你的夸奖。就像魏书生夸奖考试只得了八分的学生是“天才”，这样才能真正起到鼓励的作用。虽然学生也需要批评，但批评更要讲究方法。适时的鼓励、恰当的批评，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力量。

于大脚商店及其他

电视剧《乡村爱情》中有个人物叫“谢大脚”，这是她的绰号。剧中讲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甚至就是眼下的故事。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人叫这样的外号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叫“大脚”的人很多，因为那时的女人还有裹脚的封建习俗。凡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即使并不富裕，家境稍过得去的人家，女人都要裹脚。只有没条件讲究的穷人家，女人要抛头露面干体力活，才不裹脚。对这种“天足”的女人，人们就习惯称她们“某大脚”。如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女人不裹脚了，哪还有“与众不同”的大脚女人？所以，电视剧中的“谢大脚”，我怀疑是编剧根据自己的记忆给人物起的名字，并不是现实中真有的人物。

我刚记事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小镇上有家商店就叫“于大脚”。因为离家近，我们最熟悉，也经常到那里买东西。那时我并没想到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只认为就是那家商店的名字。人们要去商店买东西，就说“上于大脚去”。买东西回来，也说“是在于大脚买的”。那家商店还有一个名字，叫“供销三分店”，但很少有人这么叫。

后来长大了，我还常想着这个名字。我推测，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一个外号叫“于大脚”的女人开的这家商店。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家商店被收归国有，并改名字为“第三分店”（当时镇子里有三家商店，另外两家叫“第一分店”和“第二分店”）。我记事的时候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商店之类的场所早已没有个人的了，可是人们还是这样叫，可见习惯对人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我就根本没见过“于大脚”这个人，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她的绰号我现在还记得。

说起于大脚商店，除了在那里买过东西，是一间很宽大的平房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记忆了。倒是“于大脚”这个名字，常令我感觉到习惯的顽固性。这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现象。

如今五十岁往上的人都还记得，我们曾经把一切需要购买的、经过工业制作生产出来的商品都叫作“洋××”，比如“洋铁”“洋布”“洋灰”“洋火”“洋车”“洋镐”“洋锹”“洋蜡”“洋钉子”“洋瓷缸”等等。这个“洋”字应

该是指“西洋”，带上它就表示“外国人制作的东西”。对此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曾经很落后，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工业革命风风火火，并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而中国还处在半封建的农耕状态，没有自己的工业。外国的工业产品进入中国，国人就称之为“洋货”。后来中国也有了民族工业，能够自己生产工业品了，但国人还是这样叫。包括外国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东西，凡是和“洋人”沾边的，我们就一直这样叫。不仅商品这样叫，就是干活不出力，也叫“磨洋工”，追求一点规模，就叫“贪大求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中国讲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以很少和“洋人”往来，很少再用“洋人”的东西。我们用的工业品早就是自己生产的了，就是“国产”，可以算是纯粹的“国货”，可是我们还是这样叫。我们只知道“洋火”“洋蜡”，天天说着“洋镐”“洋锹”，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不爱国的思想。

又经过了几十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把商品叫作“洋××”了，即使真是从国外进口的东西，我们也不这样叫了，因为习惯说话带“洋”字的人越来越少。新一代的人早已脱胎换骨，陈旧的观念总会逐渐淡化、消失，被新的观念代替。这应该算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吧。有些词汇也可能约定俗成，固定下来，虽然已经和它最初所指代的事物名实不符，却可以成为某种事物的专有名词，不再改变，比如“火车”“马路”等就是。

有趣的是，前些时（大概是2015年吧），我在电视里听到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说到了“洋镐”——就是尖镐。也许他是出于无意，随口说出的，而且也没有丝毫别嘴的感觉，说完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节目继续进行，别人也没有提出疑义，但是我注意到了。我想，现在还能够在受众广大的官方媒体上听到这样的口语，说明这样的印记还没有完全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

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小镇子，如今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个曾经的于大脚商店所在的地方早已盖起了楼房。住在那里，还知道“于大脚”这个名字的老人，恐怕也不多了吧？